

政府工作报告

周恩来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在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會議上

各位代表：

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會議閉幕以来，已經整整一年了。这是偉大的轉变的一年。在这期間，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取得了基本胜利，使我国社会生活發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建設也获得了巨大成績，使我們有可能在今年完成和超額完成發展我国国民經济的第一个五年計劃。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實踐中，我們取得了許多宝贵的經驗和教訓，使我国社会主义事業的繼續發展更加有了保証。这一年，就是以这些偉大光輝的成就載入我国史冊的一年。

关于一年来的政府工作，国务院决定由我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會議作报告。我的报告，是依据毛澤东主席在最高国务會議第十一次扩大會議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报告所提出的方針，来檢查一年来政府的工作，并且解答各方面对政府工作提出的意見。这个报告分为五个部分：（1）关于社会主义革命；（2）关于社

社会主义建設；（3）关于人民生活；（4）关于国家基本制度；（5）关于国内外团結。

一、关于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五六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業、手工業和資本主义工商業在生产資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亿二千万农户和五百多万个手工業者的个体經濟已經变为集体經濟。七万户的私营工業企業已經变为公私合营企業，將近二百万户的私营大中小商店，已經变为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組或者直接变为国营商店。这是把几千年来的生产資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由于各种条件的成熟，由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確領導，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在这样一个大革命的过程里，社会財產沒有遭到損坏，社会秩序沒有發生混乱，社会生产沒有下降。恰恰相反，我們在这个大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的第一年，就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一九五六年的自然災荒，不仅是我国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災荒，也是几十年以来我国最大的一次災荒，被災田地約二亿三千万亩，受災人口約七千万人。在全国实行农業合作化的第一年，我国农業就經历了这样严重災情的考驗。在党和政府的積極領導和支持下，全国农民發揮了农業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实现了增产的要求。一九五六年，全国农業总产值約为五百八十三亿元，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二十七亿四千万元，接近了第一个五年計劃最后一年的指标；粮食（不包括大豆）的产量为三千六百五十亿斤，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一百五十四亿斤，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計劃最后一年的指

标。在合作化的高潮中，由于大家忙于組織合作社和积肥造肥以及兴修水利等基本建設，并且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增产粮食方面，因而使某些地方一部分农村副業的發展一度受到影响。一九五六年，棉花和油菜籽受灾最重，产量比一九五五年减少了。但是，在实现合作化的第一年，全国除了灾情严重的地区以外，就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农户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收入，减少收入的农户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对于灾区，政府去年用于防汛、搶險、堵口、复堤、救济等項的支出和發放生产救灾貸款的款項共达八亿六千万元，从去年七月到現在，向灾区調运的粮食，增加了七十亿斤，而农业合作社的集体救灾和生产互助，更起了大的作用。

一九五六年，由于城市和乡村的基本建設和生产同时增長，生产資料的需要驟然增大，因而使各种器材，特别是建筑材料和五金材料的供应出现了緊張情况。可是，尽管如此，一九五六年手工業和公私合营企业的生产和營業，也都得到了發展。这一年，手工業总产值达到一百一十七亿元，較一九五五年增長了百分之十六；公私合营企业的工業总产值达到了一百九十一亿元，較一九五五年这些企业的总产值增加了約百分之三十二。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組的零售总额达一百一十亿元，較一九五五年这些企业的零售总额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以上。在全行業实行公私合营还不到一年的時間里，政府已經完成了給私方定股定息的工作，对私方人員也作了大体安排。

人們知道，当小生产一旦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經濟以后，資本主义就失去了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础。可以这样設想，在农业合作化和手工業合作化的高潮中，在社会主义

經濟的大發展中，如果政府对私营工商業不采取一視同仁、合理安排和进行改造的方針，或者私营工商業者不参加公私合营而拒絕改造的話，那么，二百多万户私营工商業的生产和營業不仅不能得到發展，并且必然会处于被削弱以致被淘汰的地位，而私营企業的职工和一部分从業人員就会遇到失業和轉業的困难。这不仅对国家和人民不利，对工商業者更加不利。党和政府从开国以来，就把私营工商業放在国家的統筹安排之内，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而私营工商業者就在一九五六年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接受了全行業公私合营的办法，从而使全国私营工商業基本上完成了在生产資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义工商業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能够同时基本上完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国的历史發展所准备好了的。一九四九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全国範圍內取得胜利后，我国革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接着，我們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肅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的五大运动。土地改革徹底摧毁了封建基础。抗美援朝击退了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挑战，破除了我国一部分人的特别是許多知識分子的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肅清反革命运动相当徹底地打击了各种反革命分子，巩固了人民民主專政。三反五反，击退了資產階級的猖狂进攻，創造了对私营工商業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了許多反动思想，初步解决了大多数知識分子为谁服务的問題。显而易见，如果没有这些运动的胜利，便不可能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短短時間內，就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这些运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以羣众性

的斗争形式进行的，因为不采取这种形式，便不可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取得运动的胜利，同时也不能使群众在运动中得到锻炼，提高觉悟，为三大改造铺平道路。由此可知，对于五大运动无论就其成绩来说，也无论就其进行的形式来说，都是不应该怀疑的。五大运动的胜利保证了三大改造能够顺利地进行。三大改造本身也是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的。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经过了从互助组到低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的发展过程。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经过了从供销小组、分散生产联合经营等低级形式到手工业合作社的高级形式、从小规模的手工业合作社到规模较大的手工业合作社的发展过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经过了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到部分的公私合营再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的发展过程。同时，三大改造又是相互联系配合起来进行的。了解了上述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就可以了解在涉及六万万人民生活的大变革后的第一年，工农业生产不仅能够正常进行而且能够获得很大发展的根本原因。

在上述巨大的群众性运动中，在具体工作上发生过一些偏差和错误的。政府对于这些偏差和错误，有的已经作了检查和处理，有的正在检查。我们欢迎全国人民继续提出批评和建议。当然，我们在检查偏差和错误的时候，要分析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要分析在当时那些偏差和错误是可以避免的，那些是不能完全避免甚至是无法避免的。这样，我们才能判明这些偏差和错误的性质、程度和范围。对于那些在当时条件下确实可以避免的偏差和错误，我们必须引以为戒，坚决纠正；对于在运动中受到不应有的损害的人，我们应该

公开向他們道歉；在运动中沒有处理完畢的問題，現在應該由有关机关迅速予以处理。

但是，历次运动中發生的偏差和錯誤，是掩盖不了当时产生这些运动的客觀需要和历次运动的基本成績的。以思想改造运动來說，由于这个运动也是以羣众运动的形式进行的，某些問題的处理是比較粗糙的，因而损伤了一些从旧社会来的、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的自尊心。但是，通过思想改造运动，确实帮助了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数基本上渡过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在这次整風运动中，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数都表示贊成社会主义，就是証明。再以肅清反革命运动來說，在政府历年来处理的反革命分子中，計有以下四类：（一）因积惡累累民憤極大而判处死刑的占百分之十六点八，其中絕大多数是从解放后到一九五二年判处的，这在当时是絕對必要的；（二）实行劳动改造的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三，其中已經刑滿釋放或者安置生产的占百分之二十五点六，現在在押实行劳动改造的占百分之十六点七；（三）实行管制的占百分之三十二，其中已經解除了管制的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九，現在仍管制的占百分之九点一；（四）逮捕后寬大处理、教育釋放的占百分之八点九。由此可知，在这些反革命分子中，有百分之五十七点四是經過劳动改造或者寬大处理而得到釋放和撤消了管制的，他們已經獲得了重新做人的机会，其余仍在劳动改造或者管制中的，只要他們認罪守法，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也將會得到重新做人的机会。根据政府的初步檢查，对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处理，有偏差的是極少数，而絕大多数是完全正確的。有人認為肅反的偏差竟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是完全沒有根据的。毛澤东主席已經提

出还要对这一运动进行一次检查，我们相信，检查的结果会继续证明这一点。

过去进行的五大运动，或者是民主革命的彻底完成，或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因此，决不能拿革命运动中个别的乃至部分的错误来动摇革命运动的成果。即使在个别单位甚至个别地区发生的错误比较严重，也依然不能否定这些运动的成果。党和政府每当提倡一种运动的时候，都是根据客观的迫切需要，经过慎重研究和典型试验才提出的，而每次运动又动员了广大群众参加并且得到他们的拥护。这样就保证了运动的成就是基本的，偏差和错误是个别的。有人认为，如果我们说这些运动的成就是基本的，偏差和错误是个别的，这就是“教条主义”，这就是“公式”和“新八股”。实际上，这些人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公式”和“新八股”等等口号，就是为了夸大错误、抹煞成绩，引导一些立场不稳或者不明是非的人把这些个别性质或者部分性质的偏差和错误，看成是这些运动的根本性质或者全面性质的错误，以达到他们动摇革命运动成果、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

我们说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胜利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但是这并不是说，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着重地提出要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这并不是说，现在就没有敌我矛盾了。应该指出，目前在国内外还有阶级存在，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虽然已经早被消灭，但是这些阶级的分子，还正在劳动中、生活中改造着，而他们固有的阶级思想和阶级感情，还不可能完全改变。私营工商业者的绝大部分虽然参加了公私合营，但是由于他们还拿定息，对工人阶级还有剥削关系，因而资

产阶级的兩面性依然存在。例如，有人主張或者贊成把股息延長到二十年，有人想要把二十年的股息一次付清，有人說股息不是剝削，仅仅是“不劳而获”，說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已經沒有本質的差別，甚至說“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危险的敌人”。这些謬論都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圖、貪得無厭的剝削思想的一面在作祟，都是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企圖打掩护。有少数资本家主張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業，更是拒絕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露骨的表现。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表明资产阶级还存在着兩面性嗎？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說明资产阶级分子还有繼續改造的必要嗎？对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他們进行自我批判，逐步改变资产阶级的立場和思想感情，也就是要他們得到“脱胎換骨”的本質改造。要作到这一点，又非經長期的改造功夫不可。这对絕大多数願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商業者來說，又有什么不好呢？現在不是已經有越来越多的工商業者認識到了这一点嗎？由上述情形看来，在人民內部矛盾中，目前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对抗的一面，还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更不必說在人民內部之外，还存在着我們同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和国外的帝国主义的敌我矛盾了。正如大家已經明白看到的，在这次整風运动中，有思想斗争，也有政治斗争。因此，当我們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时候，絕不能無視还有阶级斗争的存在，也不能無視还有敌我矛盾的存在。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繼續进行和徹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还是我們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关于社会主义建設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是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进行的。在我国發展国民經济的第一个五年計劃中，我們已經正確地规划了建設和改造相結合的步驟。而一九五六年，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的到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有了一个躍进的發展，經濟事業和文教事業的發展規模和速度，都大大地超过了五年計劃的前三年，有些甚至超过了前三年增長的总和。

現在我举出一些数字說明这个情况。

我国的工業总产值（不包括手工業产值，下同），在五年計劃的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七十七亿元，而一九五六年这一年就增加了一百三十九亿元。正是由于这种迅速的發展，一九五六年的工業总产值达到了五百八十六亿元，超过了五年計劃所要求的一九五七年的指标。从主要工業产品看，鋼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五十万吨，而一九五六年就增加了一百六十一万吨。金屬切削机床的制造，前三年由于調整設備和改变型号的原因，虽然在台数上比一九五二年沒有显著的增加，但是在新品种增加和質量的提高方面，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到一九五六年，在这一新的基础上，又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一万二千二百多台。此外，如电力、煤炭、石油、化学肥料、水泥等重工業产品，一九五六年的产量比前三年的年产量都有較多的增加。噴气式飞机、載重汽車、大型發電設備和單軸自动車床等重要新产品也都是在这一年制造成功的。輕工業生产由于一九五五年农業丰收的有利条件，增長速度很快。例如，棉紗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三十五万件，而一九五六年就增加了一百二十七万件；棉布的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二千零五十万匹，而一九五六年就增加了四千三百万匹；食糖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十六万吨，而一九五

六年就增加了將近十一萬噸。

一九五六年，我國的農業在嚴重的自然災害中，如前所說，總產值仍然增加了二十七億四千萬元，超過了前三年平均每年增加二十三億八千萬元的水平。一九五六年，在國家和農業合作社的通力合作下，農業建設有了很大的發展。前三年共開墾荒地三千六百萬畝，而一九五六年就開墾荒地二千九百萬畝；前三年擴大的灌溉面積共四千一百多萬畝，而一九五六年就擴大了一億多亩。

一九五六年全國完成了將近一百四十億元的基本建設投資額，等於五年計劃規定的投資總額的三分之一，因而改變了前三年基本建設投資只完成五年計劃一半稍多的情況，使前四年完成的比重達到百分之八十六，這就保證了第一個五年的基本建設計劃能夠超額完成。一九五六年新增加的鋼的生產能力，就有一百四十二萬噸；新建和修復的鐵路，就有三千一百零八公里。

同生產和建設的迅速發展相適應，一九五六年在運輸方面和貿易方面，也都有很大的發展。全國現代運輸工具前三年的貨運量共增加了一億一千二百萬噸，而一九五六年就增加了九千三百萬噸；商業機構零售總額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一十三億元，而一九五六年就增加了六十二億元。

一九五六年文化教育事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

顯然，一九五六年的建設成就是極其巨大的。這就使國家有比較充足的力量來支援新生的合作社經濟和公私合營經濟，從而加強了社會主義經濟的陣地，鞏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同時，又保證了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各項指標有可能比較順利地完成和超額完成，從而準備了實行第二個五

年計劃的有利條件。

一九五六年政府對國家建設工作的安排，總的說來是正確的，但是也存在着不少的缺點和錯誤。這些缺點和錯誤，將要在李先念、薄一波兩位副總理代表國務院分別作的關於國家預算的報告和關於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中詳細指出。一九五六年預算開支中的某些項目和國民經濟計劃中的某些指標，是大了一些。從財政方面說，執行國家預算的結果，當年支出超過當年收入十八億三千萬元，動用了歷年財政結余十六億五千萬元，並且從銀行透支了一億八千萬萬元，銀行發行貨幣也多了一些，因而動用了庫存物資大約二十億元。從經濟和文教方面說，基本建設投資多了十五億元到二十億元，同時，職工的人數增加多了，高等和中等學校的新生也招多了，一部分職工的工資也增加得多了一些。因此，雖然一九五六年我國生產資料工業的產值增長了百分之四十一，生活資料工業的產值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二，但是這兩種物資的供應都較緊張，並且減少了國家的物資後備力量。在造成物資供應緊張的原因中，主要是基本建設投資額大了一些，“攤子”鋪得多了一些，這樣就多增加了財政的開支，多增加了職工人數和工資總額，也就多增加了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消耗。

對於一九五六年的基本建設工作，我們應該進行具體的分析。由於許多建設項目在前三年已經完成了土木建築工程，需要在一九五六年進行大量的設備安裝工程，另有許多項目已經完成了設計和施工準備工作，需要在一九五六年開始大量施工，並且還由於設計和施工力量的壯大，設備自給能力的增長，需要在一九五六年安排一些新的項目，這樣，就使基本建設的項目大大地增加了。現在從建設項目來看，

大多數是安排得恰當的，有小部分動工過早了，或者進度過快了，也有個別項目，是安排得不恰當的。不恰當的項目，顯然是錯誤的。那些動工過早和進度過快的項目，在當年確實造成一些損失，但是，對於長遠的建設事業還是需要的。同時，有一些項目，主要是一些非生產性的項目，由於建築標準過高，造成不少浪費。這些，都應該引為教訓，今後力求避免。

由於基本建設投資多了所造成的某些物資供應緊張的情況，我們在一九五六年的第二、三季度就已經開始察覺，並且採取了一些措施，制止了供應緊張情況的繼續發展。以後在編制一九五七年的國民經濟計劃草案和國家預算草案的時候，我們就吸取這個教訓，縮減了一部分基本建設投資，適當地增加了國家的後備。

這次提交大會審議的一九五七年度的國家預算草案和發展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各種數字表明，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以既積極又充分可靠的步驟向前發展的。一九五七年的國家預算收入比一九五六年增長近百分之二；為了避免像去年那樣在財政上出現赤字的现象，國家預算支出比一九五六年減少百分之四。一九五七年的工業總產值比一九五六年將增長百分之四點五，達到六百零三億元。農業總產值比一九五六年將增長百分之四點九，達到六百一十一億元。基本建設投資縮減為一百一十一億元，它雖然比一九五六年減少百分之二十，但是比五年計劃原定的一九五七年投資還多十四億元，五年合計，仍然超過五年計劃原定數約五十億元。在一九五七年已經過去的五个多月時間內，預算和計劃的執行情況，一般地是良好的。如果全國人民能夠厲行增產節約，

貫徹執行勤儉建國方針，爭取農業丰收，而不遭受大的自然災害，那麼我們就能夠順利地完成一九五七年的各項指標，也就能夠保證完成和超額完成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從而奠定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關於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建議，國務院接受了這個建議，並且正在由有關部門具體制訂中。

應該指出，我國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中所已經取得和將要取得的偉大成就，是同蘇聯人民和蘇聯政府的援助分不開的。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幫助設計和供應設備的共有一百五十六個建設項目，蘇聯給我國提供了大量的長期的優惠貸款，並且派遣了大批的技術專家幫助我們進行各項建設工作。這種真誠的援助，值得我們再一次向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謝。現在還有人企圖抹煞蘇聯對我國真誠援助的巨大意義，這顯然是在有意挑撥中蘇友誼，破壞國際團結，從而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對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最近一個時期，有些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和估計。

有人認為，我國的發展國民經濟計劃在一九五六年全面冒進了，在一九五七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顯，這種意見是不正確的。我國一九五六年的計劃，是在改造和建設的高潮中擬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大大鼓舞了勞動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他們紛紛要求增加生產，提高工作定額。一九五五年農業的大丰收，又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準備了物質條件。同時，基本建設發展到了五年計劃的第四個年度，也確實有擴大規模的必要。這些情況，都說明我們不但需要而且有可能加快建設的速度。一九五六年的計劃就是適

应这种情况，采取了躍进的步驟，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說的巨大成就。不錯，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属于局部性質的缺点。即使以基本建設投資多了十五亿元到二十亿元來說，也只占去年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仍然是局部性質的缺点。因此，决不能說一九五六年的建設是全面冒进。一九五七年，由于去年农業收成的情况不好，同时国家的財政和物資的后备力量也有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适当地放慢建設的步驟，积蓄力量，准备今后更好地前进，是完全必要的，这决不是全面冒退。我們應該懂得，任何事情都不会是直綫發展的。随着客觀条件的变化，發展速度总会有快有慢，并且常常会出现不平衡。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的發展也是这样。尤其是像我們这样人多且穷的国家，由于农業的比重很大，自然災害时常發生，要求国民經济年年都毫無起伏地按照同样的速度向前發展，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有人認為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劃搞坏了，这是完全錯誤的。無論从工業生产、农業生产、基本建設、文化教育或者財政收支那一方面来看，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劃都是成功的，是搞好了而不是搞坏了。以一九五七年的計劃数字同一九五二年的实际数字作比較，我国的工業总产值增長一点二倍，即增加三百三十三亿元。以鋼的产量來說，第一个五年合計將达到一千六百三十万吨，而旧中国包括日本侵略时候的东北在內，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四八年，四十九年合計的鋼产量不过七百六十万吨。当然，拿目前我国鋼的产量同工業發达的国家的产量来比还是很低的。因此，优先發展重工業同时充分注意發展农業和輕工業的方針，今后仍然應該繼續堅持。

我国一九五七年的农业计划如果完成，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二年将增长百分之二十六，即增加一百二十七亿六千万元。以粮食和棉花来说，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五年间的实际产量合计，粮食为一万六千五百八十亿斤，棉花为一亿三千万担，而旧中国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六年五年间是我国解放前农业收成比较好的年份，粮食产量合计只一万三千亿斤，棉花产量合计只六千零五十万担。不要忘记，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这个期间，还有两个大的灾荒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我们开工建设的有八百多个限额以上的工业企业，许多水利工程和铁路工程以及长江大桥工程等等，规模都比较大，技术都比较新，其中由苏联帮助设计和供应设备的一百五十六项建设工程，在技术上都是头等的。这些建设工程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在第一个五年内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今后将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建设工程，多数都是旧中国时代所不能想像的。第一个五年期间铁路共新建八千五百公里，而国民党政府在二十二年的统治期间只修建了二千六百多公里。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在这期间也有了巨大的发展，例如高等学校的毕业生，第一个五年合计为二十八万人，这就为新中国培养出大批的建设人材，而旧中国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四七年，三十六年合计不过二十一万多人。拿财政的情况来说，第一个五年合计的财政收支各为一千三百六十九亿一千四百万元，收支是平衡的。其中国外借款收入三十一亿元，只占国家预算收入的百分之二点三。这充分地说明了我国基本上是靠内部的积累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的。五年的财政支出，用于国家建设事业的约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经济建设事业和

社会文教事业的支出的比重是逐年增加的，行政和国防支出的比重是逐年降低的。这就充分地证明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和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计划。我国在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同时，由于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相应的改善，这一点，我将在报告的下一部分加以说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是无可否认的。那种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坏了的人，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抱着敌对的态度，故意抹煞全国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这样的人，他们最不高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向往资本主义经济。但是，他们的困难是，全国广大人民并不站在资本主义那一边，而是坚决地站在社会主义这一边。

有人认为统购统销糟透了，这是直接地攻击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在中国是为六万万人的生活着想的，这同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只顾少数人发财享受不顾多数人死活，是根本不相同的。我国人口众多，经济还很落后，生活消费品的供应因而不能很充足；我国的农业，有时丰收，有时歉收，并且往往这里丰收，那里歉收，为了照顾这种不平衡情况，必须在丰收的年份和地区照顾到歉收的年份和地区，并且还必须准备应付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其他意外；我国的工业和运输业的建设正在大规模地进行，城市人口也在不断增加；这种种情况，说明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如果不对粮食和其他主要生活消费品实行统购统销，进行合理的分配，那么，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就无法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就无法顺利进行。因此，对于粮食和其他主要生活消费品的统购统销，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在分配方面的一项重要政策。四年来实践证明，这个政策保证了城乡